

# 国际关系研究的亚洲地方性学派

石之瑜

**内容提要** 在亚太地区,许多学者在追求建立地区性学派。其学术探究的努力指向东西文明交会的历史时空,其目的是为了完善解释现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亚洲国家行为。本文对亚洲的地方性学派发展进行梳理和分析。本文作者认为,北京学派已经蔚然成风气,京都学派已有丰富思想基础,德里学派还缺乏学派意识,悉尼学派的建立尚难乐观,首尔学派依附于美欧的理论,东盟学派言之过早,台北学派还缺少自身的理论思想。

**关键词** 国际关系 理论 亚洲地方学派 文明政治

## 一、在亚洲开拓国际关系研究的地方性学派

日本新锐国际关系学者近来探讨建立日本学派国际关系的可能性,整理战

---

《国际政治科学》2010/3(总第 23期),第 51—73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ntional Politics*

前知识界对国际关系的讨论,从中归纳若干彼此相关的课题或关切。<sup>1</sup> 他们通过与当代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比较与对话,试图发现不同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并能有助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开展的关于国际秩序或原则的主张。大陆国际关系学者对于建构中国学派的想法有分歧,但主流的力量认为中国学派必然可以存在,展现与欧美主流理论分庭抗礼的愿望强烈。<sup>④</sup> 这派学者追求的未必是建立普遍性的理论法则,而是重视发掘不同于主流理论的法则。强调要发展普遍理论法则的大陆学者则认为不会出现“中国学派”为名的理论流派。<sup>⑤</sup> 以欧美理论为师的韩国学者,也开始从韩国的位置探索国际关系理论。<sup>⑥</sup> 同样以欧美理论为师的台湾学者缺少建立独立的理论流派思想,还只能说是茶余饭后的某种话题。

不论是调和性的京都学派或首尔学派,还是对抗性较强的北京学派,其间灵感都可归于英国学派的启发。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着重于国际间共享原理原则的研究,这些原理原则深植于欧陆哲学的传统与欧洲国际政治史的经验中,有别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总是追求跨越时空的普遍法则。如果传统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关键词是“体系”(system),<sup>⑦</sup> 英国学派的关键词就是“社会”(society)。<sup>⑧</sup> 国际间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对于这一状态,英国学派从历史与哲学

---

<sup>1</sup> Kosuke Shinzui et al., *Is There a Japanese IR? Seeking an Academic Bridge through Japanes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Series 5* (Kyoto: Asian Centre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Ryukoku University, 2008).

<sup>④</sup> 梁守德:《国际政治中的权利政治与中国国际政治学的建设》,《国际政治研究》2000年第1期,第1—11页。

<sup>⑤</sup> 阎学通、徐进:《任霸天下思想的启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301页。

<sup>⑥</sup> Kihyun Kook and Cho Yun You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 Korea: Retrospects and Prospects,” *Pacific Focus*, Vol. 24, No. 2 (December), 2009, pp. 402–421.

<sup>⑦</sup> Morton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Wiley, 1957); David Singer, *Individual Value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1971);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g Grove, Ill.: Waveland Press Inc., 2010).

<sup>⑧</sup>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William Callahan, “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Theory: Race, Class and the English School,” *Global Society*, Vol. 18, No. 4, 2004, pp. 305–323; 石之瑜:《英国学派与两岸国际关系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1期,页132—148; Richard Little, “The English School and World History,” in Alexander Bellamy ed.,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Its Cr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omelia Navari, *Theoris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English School Methods* (London: Palgrave, 2009).

的高度进行了诠释,因而俨然容许国际社会继续开展出不同的原理原则。以此类推,属于亚洲的国家基于不同的历史与哲学传统,当然会实践出自己的国际关系原则,至少亚洲国家理解主权国家行为与规范的依据,应该来自他们在彼此互动的历史长河中所累积的共同经验。

亚洲地区的群体行为者在成为国家之前,不是以主权身份在行动,甚至在进入主权身份之后,反而可能因为流离于固有文化而丧失原有的能动性,这对于自居天下中心的大清朝廷,文化与宗教都高度分化的印度,或以神国自况的日本都是如此。追求平等的主权国家身份是他们各自的任务,占据了大部分亚洲国家的建国议程。<sup>1</sup> 如何依照欧美的国际关系原则发奋图强,并审视自己的表现,争取欧美国家的认可,成为亚洲国家近代化进程中共同的经验。从这种意义上说,国际关系理论就不只是客观分析的框架,它也是亚洲国家成为正常国家的教战手册。但如果不根据既有英美理论,而另谋研发属于自己国家的学派,则会引发另一方面的问题,即通过自身的努力表明自身与西方国家典型不同,反而会与追求成为正常国家的初始愿望发生冲突,并让外人把这看成是自己仍然没有达到正常国家标准的证据。

来自亚洲的所谓地方性学派思维,有其相通之处,即他们对文明的关切。所谓文明,指的是具有历史性的某种长期生活与交往模式。对文明的关切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正在引发好奇,<sup>④</sup>似乎催生着亚洲版的国际关系理论。本文以下将指出,这些探究亚洲学派的努力,无不指向自己身处于东西文明交会的历史时空,不同于国际关系理论纯粹仅出于欧陆的思想脉络,或奠基于泛称为西方文明的历史实践,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家们不能有效处理处在文明之间的亚洲。亚洲国家是文明的代理者,受到文明力量节制。然而,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下,主权国家本是宗教战争的产物,主权国家率先要保护的是人民宗教自由,因此文明力量乃在主权之内形成,后来甚至由主权国家促成公民民族主义

---

<sup>1</sup> K. M. Panikkar *Asia and Western Dominance* (New York: Collier Books Inc. 1969); Stephen H. Hay *Asian Ideas of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sup>④</sup> Timothy Bynes ed., *Religion in an Expanding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eter Katzenstein ed., *Civilizations in World Politics: Plural and Pluralist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09).

的理论。<sup>1</sup> 20世纪60年代新兴国家大量出现,主流理论以国族建构与国家建构为建国的两个先后过程,<sup>④</sup>假定殖民母国任意切割族群所划定的国界,终能凝聚异教异族于一炉。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面对从文明史与思想出发的各个亚洲的国际关系地方性学派,探究其内涵为何,它们相互之间有何异同,与各自的历史有何关联,仰赖的思想路径为何,颇有必要。

由于地方性学派仍不成熟,因此以下从每个社群先归纳一种相对可信的方案,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至于地方性学派的判定标准则在于,因为出于不同的文明政治经验,而能对主权国家行为的意义与国际关系的本质,产生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不一致的理解。因此,地方性不是特指出于国家或主权范畴,而可以是国家层次以上,或国家层次以下,或国家间的社群,因此是根据某群聚的文明观所归纳的一种方案。这是一种既无排他性,亦非整体性的立场,由此揭示的是可能性与可信性。由于有的方案是从哲学思辨推演而出,有的是从政策实践中推演而出,因此在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之间,不作层次的区隔,此一层次区隔出自主流国际关系的本体论假定,亦即国家与国际之间有不可跨越的行为结构,恰为反思亚洲国际关系的对象。本文则反省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所共享的本体主张,在于对于亚洲以外的社群在理解国际关系或制定外交政策时,有无普遍适用性、相互模拟性或启发性。

---

<sup>1</sup> Feld Greenfeld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Yael Tanzi *Liberal Nation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sup>④</sup> Lucien Pye *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Nation Building: Burma's Search for Ident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Myron Weiner & Samuel Huntington,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Development* (Long Grove, Ill.: Waveland Press, Inc., 1994); Francis Fukuyama *State Building: Governance and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Francis Fukuyama *Nation-building: Beyond Afghanistan and Iraq*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 二、有意识的学派建设

### (一) 北京学派

中国<sup>1</sup>成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遭遇的国家主体性课题非常多,其中涉及到为建立民国而对满清进行的革命,<sup>④</sup>建国过程中将境内边疆异族转化为少数民族的过程,<sup>(四)</sup>加入国际金融与贸易体系的改造,<sup>¼</sup>争取成为国际法与条约体系中平等的一员,<sup>½</sup>动员农民成为具有政治参与意识的公民,<sup>¾</sup>发展国防武力取代文化正统性的攘外安内问题,<sup>⑤</sup>等等方而。其中贯穿的线索是,因为天下观转化为领土疆域为内涵的主权观后所面临的主体意识重建。<sup>(t)</sup>天下观的主要课题是一统与振兴,主权观之下按理没有天下一统或成为天下表率的问题;而以反求诸己,聚养生息为主的天下定于一的思维,更转变成利害导向。尽管从天下观到主权观的发展有赖于自我认识的彻底改造,但由于建国的进程是在列强环伺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被迫开展的,导致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努力中反映出的工具性远远超过了目的性。

由此造成的结果,以救亡图存为动机的自立自强,在百余年的围城意识下,使主权国家充其量是追求平等与尊严的机制,从而与国际关系理论假定的欧美民族国家大为不同。中国作为国家要回答的问题因而有二:一是如何有效的追赶欧美的主权能力?一是追赶过程中应如何对待固有文化?1949年建国之后,中国国力日渐成长,但上述两大问题并未得到完善的解答。不但在美苏两

<sup>1</sup> 中国所指涉的范畴以汉民族与儒家价值为主,因此不是以领土为范畴。

<sup>④</sup>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sup>(四)</sup>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6).

<sup>¼</sup>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sup>½</sup> 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

<sup>¾</sup> 白益华:《如何搞好村民自治》,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

<sup>⑤</sup> Jonathan Adelman and Chi-yu Shi, *Symbolic War: The Chinese Use of Force, 1840-1980* (Taipe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3).

<sup>(t)</sup> 石之瑜:《后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两岸关系》,《东亚季刊》1994年第26卷第1期,第94—112页。

强之间应该采取一边倒的策略,或是有无左右逢源的可能,一直难以判断,国内发展路线如何规划,也与对外政策一样陷入不断的路线之争。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边倒向(前)苏联,到了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转而为联合第三世界的路线,再到1980年代提倡等距外交后转而渐渐亲向西方。<sup>1</sup>21世纪后中国国力增长,又形成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如何追赶以及以什么身份追赶,继续着困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sup>④</sup>

早期以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世界革命理论专擅,除了借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与矛盾,也发展出和平共处五原则,将支持人民革命与维护国家之间的和平在概念上区分,且把反对帝国主义行为与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在概念上加以区分,以便和平与批判的并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辨,解决不了外交政策在革命外交、不结盟与一边倒之间的摆荡。由于其时中国势弱,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和平共处五原则显得一致,因此难以判断有无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海外学者率先探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可能性,他们从历史或固有文化的视野,分析马克思论述背后深层的政策思维,提出中国的世界观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对外政策中维护颜面的因素特别强烈,以至于中国的战争行为强调争取民心,不以占领土地、推翻敌人政权、甚或打胜仗为目的,而以表达正确的政治态度为目的。<sup>④</sup>如此,中国犹如一种意识或文化心态,<sup>¼</sup>而不是采取主权国家的典型行为方式,但早期论者并无发展中国学派意识。

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因北京政治风波导致欧美各国制裁,适逢美国提出新世界秩序,主张普世人权,形成其后民主和平学说与人道干预理论的温床,才萌生了中国特色的主张以为抗衡。梁守德率先以对抗西方介入中国内政

---

<sup>1</sup>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Kim,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i-yu Shi, *China's Just World: The Moralit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3).

<sup>④</sup>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郭树勇:《关于中国崛起的若干理论争鸣及其学术意义》,《国际观察》2005年第4期,第31—38页。

<sup>④</sup> Jonathan Adelman and Chi-yu Shi, *Symbolic War: The Chinese Use of Force, 1840-1980*.

<sup>¼</sup> Lucien Pye, "China: Erratic State, Frustrated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Vol. 69, No. 4, 1990, pp. 56-74.

为动机提出“天赋主权论”，<sup>1</sup> 这种主张虽未摆脱现实主义的本体论，但开了尔后以现实主义质疑美国的先河。之后在世纪之交有张睿壮诘问美国拒绝接受中国崛起违反现实主义。<sup>④</sup> 大陆内部的左右之争，爆发成针对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大国外交的主张或批判，至今绵延不息。<sup>⑤</sup> 这样的争辩复制了欧美国家内部政策的路线，也复制了欧美国家的中国政策中以围堵与演变为主的两条路线，其前提仍是中国积弱，且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皆与欧美对立，因而是国际关系理论熟悉的异己。虽然各家所提出的应对之道有所不同，但它们相互之间仍颇可对话。

21世纪伊始，中国崛起的分析日益涌现，<sup>⑥</sup> 固然国际关系理论自有掌握之途径，作为分析对象的中国知识界则萌生另谋国际关系本体论的意识。<sup>⑦</sup> 左派转向中国固有文化寻求不同于欧美国际关系的资源。文化原为左派所批判，<sup>⑧</sup> 至此回归，显示真正的问题仍然在于，中国成为主权国家之前的文化意识，是否应该追随或已经追随欧美理论而加以彻底改造，或欧美体系下的中国仍只是救亡图存的手段，故左派与右派的区隔只是暂时的政治现象，并不能真的说明中国的国际关系。固有文化的意识一旦勃兴，一度为主权国家观念取代的天下观再度成为中国学派的希望所在。赵汀阳将天下体系的哲学加以整理，说明固有文化以天下观天下，<sup>⑨</sup> 因而与西方现实主义中主张国家间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观点迥然不同。

天下观的国家可以说明以社会关系为主导的国际关系，它不是以冲突对立为前提，而是以长远关系的建立为目的，由此最初提出天赋主权时的对抗性已

<sup>1</sup> 梁守德：《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与中国的外交战略》，《河北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5年，第1—7页。

<sup>④</sup> 张睿壮：《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外交哲学：评世界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抉择》，《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3期，第54—67页；张睿壮：《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危机》，《国际问题论坛》2004年夏季号，第55—67页。

<sup>⑤</sup> Chi-yu Shi, “Breeding a Reluctant Dragon: Can China Rise into Partnership and away from Antagon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1, 4 2005 pp 755-774.

<sup>⑥</sup> 张登及：《建构中国：不确定世界中的大国定位与大国外交》，台北，扬智2003年版。

<sup>⑦</sup>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与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7—13页；唐世平、慕大鹏：《中国外交讨论中的中国中心主义与美国中心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2期，第62—70页。

<sup>⑧</sup> 潘维、玛雅：《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新知三联2010年版。

<sup>⑨</sup> 赵汀阳：《天下体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有所消解。江忆恩以社会国家的概念说明,中国崛起进入全球化的过程,是学习多于对抗,<sup>1</sup>可以说是欧美学者中比较接近儒家文化的学说,但他仍不能掌握以韬光养晦为原则的中国对外政策动机。天下观的中国标志着与欧美看似针锋相对的文化模式,<sup>④</sup>但又在实践上与欧美广结善缘的行为模式,与全球华人回归中国重建身份与生活空间,以及中国公民向外部世界的流动模糊了领土与亚洲的疆界,<sup>⑤</sup>成为相互呼应的潮流。在天下观里的国家,更关心的是自己如何被看待的形象问题,而不是如何维持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因而是由外而内反躬自省,不是由内而外主张自己。<sup>1/4</sup>在与邻国共同构成区域秩序的愿望下,国家不是利益的集合体或主权的维护者,而是接受天下所共同注目的无私之心所在,代表中国人的颜面。从现实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角度看,天下都像是一种中心与边陲的分野,象征中国自居领导高高在上的心态,与对边陲的忽视。<sup>1/2</sup>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能否就此提出符合天下观的理论体系,决定了中国能否复兴固有文化,提供国际关系理论与众不同的方案。

## (二) 京都学派

二战前发展出来的京都学派,是来自日本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可能方案之一,论者以京都学派哲学致力于身份论述,犹如当代社会建构主义者 Alexander Wendt 在历史前期的盟友。<sup>3/4</sup>20世纪40年代,京都学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sup>1</sup> A la stair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sup>④</sup> 赵汀阳认为,中西方价值观的排序不一样,西方把自由民主排在首位,中国把平等和谐排在首位,从而导致面临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时,中西方会出现不同选择;评价真正的普世价值有两个标准:一是被每个人认同,二是被所有人以一种科学的方式论证,按照上述标准,民主和平等就不是普世价值,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然而自由、公平、和谐则是得到普世认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全球治理跨文化国际会议,北京,2008年10月30日。见2010年5月25日的 [http://ias.cass.cn/show/show\\_events\\_b.asp?id=1084](http://ias.cass.cn/show/show_events_b.asp?id=1084)

<sup>⑤</sup> William Calhoun *Contingent States Greater China an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2004).

<sup>1/4</sup> 石之瑜、张登及:《中国崛起的认识论及其叙事衍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第37—52页。

<sup>1/2</sup> William Calhoun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2008 pp 749-61

<sup>3/4</sup>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公开而具体地提出“世界史的立场”，<sup>1</sup> 藉以支持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对向来是欧美中心导向的国际政治秩序，进行有意识的挑战与重构。世界史的立场综合了历史、神学、哲学与心理学的思维，企图融合欧陆与东洋的自我观念，进而发展成为对国际秩序的主张，<sup>④</sup> 在竞争中充满忏悔的意识。<sup>⑤</sup> 在知识史的脉络中，京都学派上承明治时期的兴亚论，经由战前大东亚共荣圈的兴衰，到战后重现的亚洲主义，并下接 21 世纪流行的东亚论，在众多学派中俨然成为对国际关系一以贯之的哲学主张。<sup>⑥</sup> 京都学派的开山鼻祖西田几多郎提出的“场所哲学”<sup>⑦</sup>，及其延展而来的“无的场所”学说，同时有道德与实践的意涵，是潜力雄厚的地方性国际关系理论基础。

京都学派要处理的问题，与同期日本知识界面临的问题相同，均可回溯到黑格尔提出的“东方专制主义”，亦即日本面对东方专制主义的质问，被迫要回答日本是否属于东方的问题。<sup>⑧</sup> 在各种可能选项中，具体要回答的问题不外乎两点，即日本与欧洲以及与亚洲的关系分别为何。<sup>⑨</sup> 脱亚论者认为日本应属于欧洲而不属于亚洲，兴亚论者认为日本属于亚洲而不属于欧洲，少数论者如津田左右吉认为日本既非欧洲亦非亚洲。<sup>⑩</sup> 无论如何，日本似乎既属于欧洲又属于亚洲的自我认识，使得上述三种答案都违反直觉的情感，导致自我定位十分困难，以至于论者经常游移于各种主张之间，被视为人格“断裂”或“转

<sup>1</sup> 高坂正显：《世界史的立场と日本》，东京都，中央公论社 1943 年版；高山岩男：《世界史の哲学》，东京都，岩波 1942 年版。

<sup>④</sup> Christopher Gotō-Jone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Japan: Nishida, the Kyoto School and Co-prosperity* (London: Routledge 2005).

<sup>⑤</sup> Hajime Tanabe *Philosophy as Metaethics* trans by Takeuchi Yoshinor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sup>⑥</sup> David Williams *Defending Japan's Pacific War: The Kyoto School Philosophers and Post-White Power* (London: Routledge 2005).

<sup>⑦</sup> 中村雄二郎：《西田几多郎》(卞崇道、刘文柱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3 年版。

<sup>⑧</sup> 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sup>⑨</sup> Josuke Ikeda “Creating the Human Security Discourse and the Role of the Academic-Policy Complex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Japanese Social Science’?” *Interdisciplinary Information Sciences*, Vol. 15 No. 2 2009 pp. 197-209; 黄佳宁、石之瑜：《不是东方：日本中国认识中的自我与欧洲性》，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研究中心 2009 年版。

<sup>⑩</sup> 刘萍：《津田左右吉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2004 年版；谢明珊：《津田左右吉认识中国的起点》，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研究中心 2009 年版。

向”。<sup>1</sup> 简言之,日本知识界既希望日本成为欧洲,也相信日本可以成为欧洲,但又不能否认日本身在亚洲,且否定不了日本身在亚洲。从大正到昭和,知识界企图摆脱身在东西之间的努力,孕育了西田那种反璞归真的知识目标,企图藉由回溯文明发展轨迹,来重建日本在世界史中独特而又普遍的地位。

包括东京学派的白鸟库吉与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都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寻找答案。白鸟库吉与他的学生津田左右吉都嫌恶中国,<sup>④</sup>内藤湖南则以中国文化的继承人自居,<sup>⑤</sup>与其他同情或蔑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各自基于自己的理由,对于日本军阀在“满州国”建立皇道乐土充满热情,<sup>⑥</sup>则这个巧合俨然不全是巧合,因为甚至到了21世纪,后现代的日本艺文界继续传承着某种对在“满州”建立皇道乐土的憧憬。“满州国”建立之后不久,皇道乐土便成为大东亚共荣圈所奠基的论述基础,京都学派学者在以近代的超克为名来支持战争的座谈会中,采取了日本古事记有关八纮一宇的描述,来勾勒理想中的国际秩序。古事记与京都学派的联系虽然隐晦间接,实则深刻有力。在这样的联系中,日本国际地位的界定有赖于对于文明源起的回溯,这一回溯不能只是历史的,因为历史的日本甚至对朝鲜都有所依赖,因此这样的回溯必须是哲学的。

京都学派提出了场所哲学,<sup>⑦</sup>来说明为何日本可以与世不同地存在于东西之间,因而既能免于中国天人一体的浑沌静滞状态,又能免于黑格尔辩证哲学对正反矛盾必求一合的冲动。据称日本所处的位置,是在东西文明得以开展之前的无的场所,日本不需要进入到任何具体的场所而自有其基体,这样的基体出自神的授予,因而不受后来的文明发展所拘束,从而日本得以学习融入任何

---

<sup>1</sup> 叶纮麟:《德富苏峰的中国认识》,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研究中心2009年版。

<sup>④</sup> Stepha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sup>⑤</sup> 钱婉约:《内藤湖南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Joshua Fogel *Politics of Sinology: The Case of Na'ito Konan, 1866-1934*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sup>⑥</sup>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走向亚洲的航踪》(张学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sup>⑦</sup> James Heisig *Philosophers of Nothingness: An Essay on the Kyoto Schoo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藤田正胜:《“场所”来自根本处的思索》载于成中英编:《本体的解构重建:对日本思想史的新诠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文明情境,却又保留退出之后再进入其他文明情境的普遍性身份。此一身份无语言可表达,也不应该有语言加以表达,因此又是一种潜意识的力量,敦促日本不断吸收学习。根据白鸟的分析,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导致中国不能学习,而欧洲不了解东洋,以致误认为自己代表普遍,唯有日本真正能贯穿其间。<sup>1</sup>白鸟利用“南满铁道部”的经费在满蒙研究,辩称满蒙乃是基督教与儒教的共同缘起所在,等于证明“满州国”是民族共和的皇道乐土。唯有如此的世界史立场,方能超克近代化所散布的西方偏狭的历史。据此,国家不是能动性的根源,而是执行世界史立场的工具。

所谓世界史的立场,就是回溯文明缘起的无的场所,然后才能培养进出文明场域的能力,也才能在东西对立的文明实践中,掌握真正的世界历史,而不局限于欧洲自己的文明进程。这个立场在日本军阀四处征战与殖民的政策实践中被证实为残忍无道,因此战后继承亚洲主义的竹内好对之大加修正。曾经为大东亚战争感动不已的他,反省大东亚共荣圈的杀戮,进而提出以自我否定为方法的亚洲主义,藉由转化成为亚洲的思想过程,抗拒日本成为欧洲、成为中国,或日本被锁入任何既定轨道。竹内好受京都学派启示,<sup>④</sup>提出以日本自身为对象的反省,并称之为亚洲方法,使亚洲成为日本可以进入东西不同文明的场域。其后的亚洲主义论者纵使未必采取竹内好的逻辑,但均同在京都学派的思维脉络中。如沟口雄三继续借用基体的概念,<sup>⑤</sup>主张日本必须先退出日本的情境才能掌握中国的基体,而一旦能够退出日本自身,便能进入世界;或如子安宣邦强调东亚绝非实体。<sup>⑥</sup>在这些主张中一以贯之的,似乎是日本在东西之外的场域独享进出东西的能动性。

与此相较,英国学派以无政府状态为国际秩序的主张,或社会建构主义以不同形式的无政府状态,说明何以国家的身份意识若有变迁,足以导致国际秩序的变迁,两者均视国际政治秩序的建构,后于国家的生成,且国际秩序与国家的存在之间相互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有相互矛盾,这些矛盾必须处理。京

<sup>1</sup> 石之瑜、叶纾麟:《东京学派的汉学脉络:白鸟库吉的科学主张及其思想基础》,《问题与研究》2006年第4期第5卷,第1-16页。

<sup>④</sup>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5年版。

<sup>⑤</sup>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林右崇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9年版。

<sup>⑥</sup> 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

都学派及其分支的主张与此相反,认为国家间的矛盾存在于具体场所,而并非自我的原初意识所在,并进而主张无的状态远在国家存在之前,先退到无的状态,才能再进入不同的文明。而能够进出不同文明,则是完成世界史立场所必须。相形之下,以欧美民族国家所建构的无政府状态为依据,进而改造转化不同文明成为民族国家,便是违反世界史,并毁灭普遍性的作为。这样的世界史立场,冥冥中已影响到东亚邻邦知识界对亚洲主义的态度,或许邻邦知识界切入点各有不同,但无不强调边陲视野,抗拒民族国家立场,被动保留差异,<sup>1</sup>尤其是珍惜自我认识之间的差异,而不是在同一种身份上主张各自为政的势力范围,他们因而将少数民族、离群、同志、移民工,宗教团体等等不同的身份可能,不断加到以民族国家为主的国际秩序中<sup>④</sup>。

### 三、其他地方性学派的可能性

#### (一) 德里学派

印度知识界是后殖民理论的重要渊源,一方面受到英国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拥有悠久且多元的文明与次文明。有人认为,印度作为一个文明是英国殖民主义学术的产物,<sup>④</sup>以至于向英国争取独立的过程,犹如印度国族建构的过程,使得印度知识界必须思考印度是否与英国是同性质的国家,因此必须在印度自己难以定于一的固有文化与欧美文化之间思索自我定位。<sup>¼</sup>即印度是否应遵循主权国家的原则,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汲取智慧,并争取平等。印度建国之前出现泰戈尔与甘地之间的争论,<sup>½</sup>前者主张透过精神的砥砺,超越东西文明的差异,使每个人都自成文明融会的主体,而甘地则务实地以印度国族

<sup>1</sup> 白永瑞:《思想东亚:韩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台北,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 2009年版;陈光兴:《关于东亚论述的可能性》,《书城》2004年12月号,第35—45页。

<sup>④</sup> L. H. M. Ling, Ching-Chane Hwang and Boyu Chen “Subaltern Straits ‘Exit’, ‘Voice’, and ‘Loyalty’ in the United States-China-Taiwan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0, 2010, pp. 33-59.

<sup>④</sup> R. C. Zaehner *Hindu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13.

<sup>¼</sup> Ashis Nandy *The Intimate Enem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sup>½</sup> Kalyan Sen Gupta *The Philosophy of Rabindranath Tagore* (Surrey: Ashgate, 2004).

主义的建国为政治目标。如此争论类似于东亚国家面临的文明抉择,它也成为德里学派的可能基础。

印度知识界对于身处于东西之间有何意义,有意识进行了探讨,<sup>1</sup>进而注意到盛行于东亚的佛教来自印度,而印度参与英语世界的管理与沟通几无障碍,反而国内语系繁多,国族的完成尚须仰赖以英语为国语,<sup>④</sup>可见印度作为文明桥梁更胜于其他亚洲国家。与西田几多郎不同的是,泰戈尔所代表的一种印度思想界的立场,认为超越文明的歧异必须仰赖精神的超越,这是每个人自己的灵修,但前者却从哲学上采取回溯文明缘起的方式,似乎毋须任何努力便可宣称已经达到普遍性。<sup>(四)</sup>包括泰戈尔在内的印度知识界,都能在两分法的欧美哲学思维之外,建立看待世界的方式,因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固然难以避免,却有其他无限丰富的秩序观整合看似人我二分的主流世界观。<sup>¼</sup>

德里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可行性的基础在于,在宏观与历史的层面,文明之间的关系总是相互交流,相互学习,而印度在历史长河中贡献非凡。从这种角度看,国家之间的争议充其量是短暂的,冲突的化解可以透过时间拉长而无限延迟其必要性。不过,若涉及具体的政策与对象,则永远存在利益冲突的可能与尔虞我诈的交往模式。换言之,纵使在世俗的竞争中国家之间缺乏信任,印度身为国家不得不采取迎头赶上的政策,但在精神与灵性的追求上,印度提供了迥然不同的时间观,不但影响了动员的效能,也对于在竞争中建立伦理抱持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可以说,德里学派的国际秩序中,同时拥有宽容与猜疑,耐性与谋略。

<sup>1</sup> David Kopf ed., *Bengal Regional Identity*. (East Lansing Michigan Asian Studies Center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69).

<sup>④</sup>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Minute of 2 February 1835 on Indian Education" *Macaulay, Prose and Poetry*, selected by G. M. You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729

<sup>(四)</sup> 黄威霖:《文明差异与现代性:泰戈尔的政治理想及其对中国文明的期盼》,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研究中心 2010年版;尹锡南:《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成都,巴蜀书社 2003年版。

<sup>¼</sup> Rabindranath Tagore, *Towards Universal Man*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1), pp. 91-63; Ashis Nandy, *The Illegitimacy of Nationalism: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the politics of self*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不结盟是印度近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佳作,<sup>1</sup>在东西两大阵营的对峙下,由同时具有知识分子身份的总理尼赫鲁所主导,因而超越了对立。不结盟运动与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不同,毛泽东旨在建立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尼赫鲁并无对美苏两强进行革命推翻的意图。他的败笔是在1962年与中国发生边界战争,在具体事务上纵容了主权国家相互猜疑的氛围,却又认为中国与印度同是受帝国主义之害的悠久文明,因而没有意愿从事真实的冲突。<sup>④</sup>超越两分法的不结盟与陷入两分法的边界冲突,是德里学派的两大参数。

## (二) 悉尼学派<sup>(四)</sup>

澳洲本是英国罪犯的流放地,进而演化成海外垦殖的所在,二次大战之后才开始建立外于英国的主体意识。澳洲原本行使白澳政策,歧视包括华人移民工在内的有色人种,其动机不过是为了摆脱澳洲过去作为流放地的形象,以有色人种当成投射自卑而排除的对象。<sup>1/4</sup>早期澳洲国际关系文献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界定与英国的关系以及控制与亚洲各种族(如日本、中国)之间的关系。<sup>1/2</sup>国协意识可作为澳洲学派的基础,早期是作为大英国协的成员如何行为方才适当,如今的可行选项是如何将澳洲自身视为某种国协,容纳多元族群,增进世界性。<sup>3/4</sup>20世纪80年代以后,澳洲在身份意识上经历重大转变,不再以依附于欧美为满足,积极追求成为一个亚洲国家与全球国家,排华政策随之改弦更张,除在国内建立平等的多元文化保障外,还吸引包括亚洲移民在内的各国移民前往澳洲定居。澳洲原本作为大英国协的一员,如今澳洲本身形同于一个国协。

---

<sup>1</sup> D. C. Pande, *India's foreign policy as an exercise in non-alignment: Nehru-India period, 1946-1976* (Kanpur: Gyanodaya Prakashan, 1988).

<sup>④</sup> G. I. D. Shingkar, "The Nehru Years Revisited," in Chung Tan, ed., *A cross the Himalayan Gap: An Indian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China* (New Delhi: Gyan Pub House, India Gandhi National Centre for the Arts, 1998).

<sup>(四)</sup> 一位大陆同仁曾反对将澳洲纳入亚洲,本文以澳洲同属欧洲殖民地,且即使不同时期的澳洲文献理解亚洲的角度迥异,或贬抑,或共生,均有意识地以亚洲为其身份论述的重要依据。

<sup>1/4</sup> John Fitzgerald, *Big White Lie: Chinese Australians and White Australia* (UNSW: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2007).

<sup>1/2</sup> James Cotton, "Realism, Rationalism, Race: On the Early International Relation Discipline in Austral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3, No. 3, 2009, pp. 627-647.

<sup>3/4</sup> 黄源深、陈弘:《从孤立中走向世界:澳大利亚文化简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所谓国协意识,亦即在构成澳洲国家的同时,一改过去排斥种族的态度,经由开放外来移民所建立的全球性,使得澳洲社会与澳洲知识界均能如同国协一般,各国知识分子到了澳洲共同组成一个澳洲社群,但他们又各有文化传承,各有主体性,都构成澳洲的次文化,并且其文化差异受到有意识的尊重与代表。也犹如澳洲是一块大陆,同时拥有大河与海岸,高山与沙漠,各种地理环境孕育出不同的人文景观,共同构成一块澳洲大陆,虽然大陆不具备一种整体的共性,却又同属于相互影响联系的同一块大陆。差异共容于一体的澳洲社会与澳洲大陆,仰赖与欧亚各地的互通与交往来维系全球国家的身份意识,这影响到澳洲看待其他国家与国际秩序的方式。

悉尼学派的可能性反映在澳洲学者重视对中国、东南亚与南太平洋群岛问题的研究上。<sup>1</sup> 澳洲的东南亚研究包括对土著与华人社群的研究,犹如澳洲学者进出东南亚或中国,并无进出民族国家疆界的不便。若以澳洲的中国研究社群为例,其特色在于学者来自各国,对于构成中国的次体系或基层尤其重视,<sup>④</sup>以从中解读各种具有当地特性或主体性的理论诠释。澳洲将中国解构成基层区块,与战前日本大东亚主义或当前右翼将中国解构成统治区块的意图迥异。日本论者将中国零碎化,其目的在于解构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以便重新整合成由日本领导的亚洲,进入世界史。而澳洲中国研究者对中国的解构,则仅着眼于对地方主体性的发掘,犹如将中国视为一个多元一体的国协,既不同于美国知识界流行以中国的地方或基层为案例研究,来验证普世社会科学法则,亦无重组亚洲的政治意图,更无中国中央政府查访民情以建立全国一体化政策的

<sup>1</sup> Geremie Barme, "On New Sinology," from the China Heritage Center at <http://rspas.anu.edu.au/pah/chinaheritageproject/newsinology/index.php>, accessed on March 21, 2010; Gungwu Wang, *Community and Nation: Essays 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 Books, 1981); Greg Dening, *Beach Crossing: Voyaging Across Time, Cultures and Self*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sup>④</sup> Hans Hendrichk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Provinces: Competitiv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London: Routledge, 1999); Louise Edwards and Mina Roces, *Women's Suffrage in Asia: Gender, Nation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2004); Baogang He,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and the National Identity Question in East Asia," *Global Governance*, Vol. 10, No. 2, 2005, pp. 227-246; Ben Hillman, "Monasticism and the Local State: Autonomy and Authority in a Tibetan Prefecture," *The China Journal*, No. 54, 2005, pp. 22-52; David Goodman, *China Deconstructs: Politics, Trade and Regionalism* (Oxford: Taylor & Francis, 2007); Colin Mackerras, *China, Xinjiang and Central Asia: History, Transition and Crossborder Interac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Taylor & Francis, 2009).

施政考虑。<sup>1</sup>

重视基层能动性为主体性,包括个人或各社群的基本人权,成为澳洲视野的国际关系基础,也造成对各国国内事务关怀,遂行人道干预的态度倾向。这种对各国人权与次级社群的关怀,反映了澳洲尊重并保障自身多元文化的警觉性,也促成澳洲学术界中某种解构大文明区块,深入次级文化或基层社群找寻多元性与主体性的愿望。次国家团体因而是构成澳洲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可行的本体论基础。则国际关系便不仅在于目前澳洲国际关系主流文献关注的国家间,而更是在次国家的基层社群之间。

### (三) 首尔学派

不论文明冲突的理论是否合理,韩国知识界对文明冲突的感受颇为真实,因为韩国一分为二,反映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日本、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对立。<sup>④</sup>另一方面,韩国有深厚的儒家文化与佛教传统,不过与其他东亚社群相较,基督教相对在南韩最为(且远为)普遍。韩战以来,美军在南韩驻扎超过了60年;而且,南韩知识界留美人数名列世界前茅。与其他东亚国家相比,韩国知识界遭遇的国际关系理论课题有同有异。相同的是,不属于国家范畴的文明问题无所不在,因此与其他东亚国家进行东亚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对话颇为可行,<sup>⑤</sup>对于东西方的对比、优劣之分、融合或分庭等议题,同样敏感而熟稔。相异的是,文明分界将朝鲜半岛划分成两个主权国家单位,所以统一问题,与文明的融合或分化问题,彼此影响。<sup>⑥</sup>

---

<sup>1</sup> 曾彦中:《澳洲中国研究的多元性:以安戈及何包钢的学思历程为例》,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研究中心2010年版;陈姿洁、吴昀展:《南方中国学:费约翰与当代澳洲特色的中国研究》,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研究中心2010年版。

<sup>④</sup> Myongsob Kim and Horace Jeffrey Hodges “Korea as a Clash point of Civilizations” *Korea Observer* Vol. 37, No. 3 Autumn 2006 pp. 513-545.

<sup>⑤</sup> David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sup>⑥</sup> Samuel Kim,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Northeast Asia* (Lanham, MD.: Rowan & Littlefield, 2003); Samuel Kim, *North Korean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Demystifying North Korea*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 S. Army War College, 2007).



韩国知识界对于探索首尔学派的可能性兴趣日增,<sup>1</sup>一方面有感于韩国国际关系的知识大量复制美国的理论,因而无法有效呈现韩国与众不同的国际处境,非常欠缺反映韩国情况的理论,这种状况必须透过对韩国学派的开展方可得到改善。第二方面认为建立如英国学派那样某种具有普遍性理论意涵的韩国学派,是韩国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知识做出贡献并获得尊敬的法门。第三方面是借鉴韩国面临独特的统一问题与安全问题,以及韩国历史上处理与大国关系的特殊实践,<sup>④</sup>首尔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有其远景。

这些建构地方性学派的动机与中国学派或日本学派相比并无根本不同,中国与日本已经有具体方向,首尔学派的内涵则有待厘清。虽然探究首尔学派是为了对既有知识体系有所贡献,并获得认可,因而在态度上并未超越美国的普遍理论或英国学派,但有两个正在形成的方向可以作为首尔学派真实的起点:一是韩国与大国交往的经验,包括历史上与中国,近代又加上与日本,<sup>(四)</sup>以及战后再加上与美国的交往经验;<sup>1/4</sup>二是在文明冲突点上尝试融合,不但是南韩试图融合不同文明,而与朝鲜关系的处理能否或如何超越冷战遗绪,更是以一个民族分成两个主权单位之后重建两者联带,来管理文明冲突融合的议题。

首尔学派所意味的,是国际关系理论不应以大国作为理论单位。国际形势

<sup>1</sup> A jin Choi, "Future Task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zing in South Korea" Mimeo at [http://docs.google.com/viewer?a=q&cache=UYqnk3ZZBQJwww.kaisnet.or.kr/board09/download.asp%3Ffile%3D268+Future+Tasks+for+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izing+in+South+Korea&hl=zh-TW&gl=us&pid=b&srcid=ADGEESgHYA2eXp4xpbNcGRTGRENVUzNzR-C998bW-dRNp7-0mmemUDvKszLKWxVp3M27s3g3pQ2117r83\\_SEyOqWlGwwhxbAyPflpM8AWGk10PFmURKx-mJqBp3c\\_RZ02Bb8n&sig=AHIEtQoRk0YAYH9TNpioOVdA9-ONFg](http://docs.google.com/viewer?a=q&cache=UYqnk3ZZBQJwww.kaisnet.or.kr/board09/download.asp%3Ffile%3D268+Future+Tasks+for+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izing+in+South+Korea&hl=zh-TW&gl=us&pid=b&srcid=ADGEESgHYA2eXp4xpbNcGRTGRENVUzNzR-C998bW-dRNp7-0mmemUDvKszLKWxVp3M27s3g3pQ2117r83_SEyOqWlGwwhxbAyPflpM8AWGk10PFmURKx-mJqBp3c_RZ02Bb8n&sig=AHIEtQoRk0YAYH9TNpioOVdA9-ONFg) accessed March 30, 2010. Chaesung Chun, "Future Tasks for Developing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outh Korea"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6, 2007, pp. 227-249. Byungwon 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and Korea" *The Kor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46, 2007, pp. 37-66. Kim Hyung Kook and Cho Yun You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in Korea: Retrospects and Prospects" pp. 402-421.

<sup>④</sup> Victor Cha,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sup>(四)</sup> Daeyoul Ku, "Kore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Colonial Period and the Question of Independence" *Korea Journal*, Vol. 38, No. 4, 1998, pp. 90-129.

<sup>1/4</sup> Chang-hee Nam, "Rebating the U. S. Force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Stained Alliance and Emerging Partnership in the Changing Defense Pos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Hilton Hawaiian Village, Honolulu, Hawaii, March 5, 2005. [http://www.allacademic.com/meta/p71260\\_index.html](http://www.allacademic.com/meta/p71260_index.html) accessed on March 30, 2010.

受到文明力量的主导,而小国正是其中重要的沟通桥梁或冲突点。从开展文明脉络的功能出发,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小国与大国之间,实具有平等地位,而小国的能动性尤其强大。比如过去朝贡关系下,韩国是附属,则可从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与朝鲜的事大主义中,解读出各自因应所处的文明间或文明内的位置,进而论述平等的两国关系。或比如韩国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性,充其量是作为大国间的区域平衡者,则首尔学派可在主权国家的框架之外,以文明融合视野探索处理半岛统一问题的解决之道,在本体论上摆脱主流国际关系理论。

#### (四) 东盟学派

东南亚各国在历史上与中国互有交往,近代以来均曾为欧洲国家的殖民地,有的则在二战期间遭日本所占领。长期以来,中国与亚洲次大陆移民在此定居者众,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华人移民所在。另一方面,世界各大宗教信徒或群聚于特定社群,如天主教的菲律宾或佛教的泰国,或共处于同一主权领土范围之内,如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包括伊斯兰教、儒家、天主教、佛教等等。其结果,二战后所独立的各个东南亚国家内部,出现欧美现代国家不熟悉的多样性的族群与文明政治。<sup>1</sup> 冷战时期,中国政治变化曾波及东南亚华人社群,并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引起反华的风潮,俟后对华人的研究层出不穷,成为南洋学的滥觞。<sup>④</sup>

在文明成为国际关系的课题之前,华人研究很少与国际关系研究对话,由于中国的崛起,引起世界是否面临中华化(Sinicization)的好奇,<sup>(四)</sup>于是中华化与前此的伊斯兰化、欧洲化、美国化等文明过程形成可资比较的新现象。<sup>1/4</sup> 其结果,导致东南亚华人学者对华人的研究具有了国际关系的含意,却也因此抵触

---

<sup>1</sup> A lan Chong "Southeast Asia: Theory between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7, 2007, pp 391-425

<sup>④</sup> 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台北,商务1994年版;廖建裕:《印度尼西亚原住民、华人与中国》,新加坡青年书局2007年版。

<sup>(四)</sup> 王赓武:《移民与兴起的中国》,新加坡八方文化2005年版。

<sup>1/4</sup> Peter Katzenstein ed., *Civilizations in World Politics: Plural and Pluralist Perspectives* (London: Routledge, 2009); Peter 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American Imperiu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华人研究之所以勃兴的动力,亦即极力建立关于东南亚华人的本土性,尤其着重将华人为因应环境而作的各种身份选择加以分类,<sup>1</sup>使外界不至于再将本土华人或华族,混淆成实务界或学术界惯称的所谓华侨或离散华人。<sup>④</sup>简言之,本土华族之说法,是以当地华人为中心的身份观念,而华侨或离散华人的概念则是中国中心意识的反射,经验显示,后者对于本土华人在本地生存极为不利。

华人研究学者因此力图在华人研究中回避文明含意,此一倾向与东南亚各国对彼此内部文明政治敏感度的相互体谅颇为一致,从而开展出东南亚各国之间迥异于欧洲所熟悉的外交模式,俗称东盟方式(The ASEAN Way),<sup>④</sup>意指东盟国家之间彼此交往的国际关系,犹如处世哲学,相互尊重,绝不干预彼此内部事务,对于既有冲突,不急于求得立即彻底解决的方案,但求先能妥善管理,不使升级。<sup>¼</sup>为能达成这样的和谐效果,重要决策或协商避免透过召开正式会议,而尽量安排在非正式场合举行,与会者则以个人身份参加。这样,成员国不至于因为在纪录上形成多数与少数,而迫使东盟整体采取立场,进而破坏绝不干预成员国内部事务的共识。欧美政府对于东盟方式颇不以为然,<sup>½</sup>认为东盟这种文化无法有效促成行动,如在缅甸问题上,东盟拒绝遵循欧美的制裁方案。<sup>¾</sup>欧美还有学者以不自由社会形容东南亚。<sup>⑤</sup>但从实践上说,东盟与缅甸的沟通管道得以继续存在,对缅甸发生灾害的人道援助也就可以到位。

东盟方式对国际关系的理论含意在于,首先在于在地中心主义,以在地者

<sup>1</sup> 廖建裕:《东南亚与华人群研究》,新加坡青年书局 2008年版。

④ 李政贤:《马来西亚〈光华日报〉的中国认识:在华侨与华人两种身份之间》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研究中心 2009年版。

④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2007).

¼ Jürgen Haacke, "Enhanced Interaction with Myanmar and the Project of a Security Community: Is ASEAN Refining or Breaking with Its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Cultur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7, No. 2, 2005, pp. 188-216.

½ Magnus Petersson, "Myanmar in EU-ASEAN Relations" *Asia-Europe Journal*, Vol. No. 4, 2006, pp. 563-581.

¾ Ruukun Katanyuu, "Beyond Non-interference in ASEAN—the Association's Role in Myanmar's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Asian Survey*, Vol. 46, No. 6, 2006, pp. 825-845.

⑤ John L. Liantud, "The 2004 Philippine Elections: Political Change in an Illiberal Democrac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7, 2005, pp. 80-101; Daniel Bell ed., *Towards Illiberal Democracy in Pacific Asia* (London: Macmillan, 1996).

实际的考虑为前提,不以抽象的价值或原则指导政策,或根据身份认同与文明归属思辨敌我。其次在于不干涉主义,这与中国长期以来的外交原则类似。再次在于交往重于改造,认为内部事务无法经由干预获得完善处理,因而国际关系的功能是提供外部环境,鼓励当事国家内部对立势力之间的对话。<sup>1</sup>最后在于国际关系的个人化与非正式化,使国家间的正式冲突得以化解或缓和,达成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 (五) 台北学派<sup>④</sup>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的知识界自感夹在大陆与日本之间难有作为,感叹台湾如同亚细亚的孤儿。<sup>(四)</sup> 中国内战结束后,国民党战败来台经营。冷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属于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如同南韩,大量仰赖美国的学说与英语媒体所提供的材料。当时根据国际体系理论,台湾不归美则归苏。<sup>1/4</sup> 即使在 20 世纪 80 年代短暂出现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呼吁,<sup>1/2</sup> 但并未及于国际关系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岛内的独立势力发展起来,这对台湾学界产生很大影响。学者们对于实力均衡的研究很少,很多人想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证明台湾有独立的权利。以至于在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要课题,是探讨与大陆及美国的关系,战略三角关系成了近二十年的显学。<sup>3/4</sup>

很早就有台湾学者研究如何使台湾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问题。<sup>⑤</sup> 长期身在边陲的无力感,导致国际关系学说得不到知识界信任,一方面国际关系是高高在上的场域,二方面又是台湾没有影响力的场域。所以知识界对国际关系抱疏离与犬儒的态度,重视的不是理论的建立,而是如何使理论有助于拓展国际

---

<sup>1</sup> Ruukun Katanyuu “Beyond Non-interference in ASEAN: the Association's Role in Myanmar's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pp 825-845.

<sup>④</sup> 一位大陆同仁反对将欧洲、日本或台湾等不同层次的群体并列,但本文探讨的是地方性社群,并不以领土或人数为导向,而是探究群聚中能否产生新论述的可能性,因而不在于有关层次上进行区分。

<sup>(四)</sup> 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 1995年版。

<sup>1/4</sup> 蔡政文:《核子时代国际关系的特质:体系、和平、战争》台北,三民 1978年版。

<sup>1/2</sup> 杨国枢、文崇一:《社会与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 1982年版。

<sup>3/4</sup> 王尧钧:《进入战略三角:认同台湾的国际政治学》台北,翰芦 2005年版。

<sup>⑤</sup> 石之瑜、颜欣怡:《作为东亚的台湾:从殖民地收编国家?》《政治与哲学评论》2006年第 18期,第 61—92页。

地位。<sup>1</sup> 在理论主要仰赖输入,输入之后主要用于宣传或辩护政策的情况下,台北学派的国际关系内容应该乏善可陈。然而,长期排除在主流国际关系之外,其国际关系学说地位无法得到提高,因此台湾学界对国际关系理论只有批评而无创造。<sup>④</sup>

由于台湾没有主权地位,因此想为台独争取主权地位的学者就批判现有的主权理论。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对主权理论与实践的解构或批判,在台湾逐渐流行<sup>(四)</sup>,尽管批判的依据仍然是来自于英语世界的后现代或后殖民理论,<sup>1/4</sup>但在多元文化与全球化的论述下,以台湾主体性为诉求的理论化努力,主要已经不是在与主流理论对话,且其间主要的文献并不出自于国际关系学界。这样的努力表现成各种话语,有的借用亚洲主义来超越两岸之间的统独问题,<sup>1/2</sup>有的借用自由主义理论说明台湾比大陆文明先进,<sup>3/4</sup>有的借用儒家学说证明台湾文化传承比大陆优越,<sup>⑤</sup>有的借用多元文化主义与和平主义理论来证明台湾社会比大陆成熟,<sup>(五)</sup>更多的是借用现实主义来证明台湾已具有主权国家的

<sup>1</sup> Chih-yu Shih *Democracy (Made in Taiwan): The "Success State" as a Political Theory* (Lanham: Lexington, 2007).

<sup>④</sup> Huang Yi-Jye "Japan as 'Self' or 'the Other'?: The Turmoil over Yoshinori Kobayashi's On Taiwan" *China Information* (forthcoming 2010); Ching-chang Chen "When is China's Military Modernization Dangerous? Constructing the Cross-Strait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U. S. Arms Sales to Taiwan" *Issues & Studies* Vol. 45, No. 3, 2009, pp. 69-119. 林炫向: "Democracy, Technology and Regime Pluralism," *Democratiz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Thinking, Doing and Being*, 发表于台湾民主基金会、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民主化国际关系:新世纪的新思维、新实践与新愿景”国际研讨会(高雄),2009年3月11-12日。

<sup>(四)</sup> 宋国诚:《后殖民论述:从法农到萨依德》台北,擎松2003年版;莫大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安全研究》台北,时英2003年版;邓修伦:《女性与联合国》,台北,扬智2003年版;黄竞涓:《成熟无政府状态、文明冲突论与全球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偏狭研究议程》《两岸与国际事务季刊》2005年第2卷第1期,第81-106页。

<sup>1/4</sup> Boyu Chen "Ching-Chang Hwang and L. H. M. Ling "Lust/Caution in Re-Democratizing World Politics with Culture as a Method" *Millennium*, Vol. 37, No. 3, 2009, pp. 739-762

<sup>1/2</sup> 李登辉、中嶋岭雄:《亚洲的智略骆文森》(杨明珠译),台北,远流2000年版;柯义耕:《台湾政治家李登辉》(萧宝辉译),台北,前卫2008年版。

<sup>3/4</sup> 江宜桦:《当前台湾国家认同论述之反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8年第29期,第163-229页。

<sup>⑤</sup> 黄俊杰:《儒学与现代台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版;余英时:《钱不是新儒家》[http://www.wenhua.cn/news\\_article.asp?classid=20&newsid=8241](http://www.wenhua.cn/news_article.asp?classid=20&newsid=8241)(2010年3月26日查阅)。

<sup>(五)</sup> 石之瑜:《家国之间:开展两岸关系的能动机缘》,台北,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2003年版;施正锋:《国家认同之文化论述》,台北,台湾国际研究学会2006年版。

行为。

台北学派的潜在议程是在主权之外找寻并界定能动者的身份,以及研究如何依附在不同文明脉络下,以暂时性的身份或名义行动,这类似于西田几多郎的场所哲学。但是台湾孤立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台湾难以进入国际政治的角斗场,故台北学派就难以在没有国际地位的假定前提下深入关于国际行为体问题的研究。看似冲突的各种主义学说与文明设想共同构成台北学派的内涵,在主权身份之外,轮流成为建立台北学派的基础。

#### 四、结 论

如果亚洲国际关系的地方性学派所追求的,是不同于英国学派所发现的国际社会互动准则,则亚洲学派无异于加入英国学派与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古典论争,并仍然只能成为英国学派的奥援。英国学派学者热心前往亚洲找寻关于国际社会的多元准则,足以证明美国以普遍法则建立国际体系的研究取向有其局限,亦即体系不能脱离历史与思想而独自存在。纵使以世界史为内容的京都学派批评了欧陆国际准则的偏狭性质,但在认识论上确认了英国学派以历史与哲学建构国际关系理论的取向。假如,亚洲的地方性学派关切的不是国际社会的原则,如台北学派关心的是非主权行为者如何编派或占用理论,以满足自身对主体意识的渴望,则便非英国学派所可收编的对象。

文明成为亚洲国际关系共同的选项,但文明是否属于国际关系理论的范畴?依照英国学派的主张,当前国际关系理论是欧陆文明的产物。如此一来,文明是高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场域,国际关系理论是欧陆文明藉以扩展的思想途径。按照这一思路,主权国家是执行国际关系理论的机制,亚洲成为主权国家互动的区域,是透过国际关系理论转化亚洲文明的成果。换言之,一旦改从文明的高度审视国际关系理论,并提供主权国家所执行的不同的文明任务,就等于是拒绝欧陆文明的普遍性,也拒绝了从欧陆文明发展而来的国际关系理论。这时再谈地方性学派或亚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否已经不属于国际关系的范畴?

甚至包括中国在内,致力于“中体西用”、“东洋文化西洋艺”的文明融合的

早期知识分子,无不以加入欧美的主权国际体系为依归。到底是将东西融于一种标准(如首尔学派的可行选项,是追求在主权统一之外化解朝鲜半岛统一问题,进而化解文明冲突的愿望)?还是东西并立成两种标准共存(如京都学派的可行选项,即诉诸无的场所,从而在世界史的立场里对矛盾的文明传统兼容并包),不求两者一贯?若已经习惯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这些在文明层次求妥协的努力,是代表国际关系理论向欧美之外扩张生根的契机呢?还是揭示亚洲国家从文明开化的道路上倒退的警示呢?地方性学派的概念是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旨意违背?并与亚洲国家追求平等的主权地位的初衷抵触?

国际关系理论范畴内的地方性学派,追求的是完善解释现有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亚洲国家行为,这也是英国学派对于亚洲的地方性学派充满浓厚兴趣的原因,除了召集组织相关讨论与写作之外,也指导亚洲国家学生就此当作论文课题。不过在发展地方性学派的同时,溢出欧陆传统而上升到文明层次的对话,进而赋予主权国家不同的文明任务,或开发出主权国家以外的能动者身份,则非英国学派可以事先预期,但亦非英国学派所必须反对。亚洲学派的理论运动方兴未艾,大陆国际关系学者的投入已经蔚成风气,而日本国际关系学者更已经有丰富思想脉络为基础。但仰赖欧美理论甚深的其他地区的学者目前还缺乏学派意识,建立成地方性学派的前景尚难乐观。

## 作者简介

杨原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2010级博士生。2010年7月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获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 yyi@163.com

孙学峰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1997和2000年在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分别获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6年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著有:《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合著,2007年)、《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合著,2005年)。

电子信箱: sunxuefeng@mails.tsinghua.edu.cn

包天民 (Jeremy Paltiel)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东亚政治和国际关系。最新著作为 *The Empire's New Clothes: Cultural Particularism and Universal Value in China's Quest for Global Status* (New York: Palgrave 2007)。

电子信箱: jpaltie@ccs.carleton.ca

石之瑜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兼任 *Political Science* (Wellington)、*Human Rights & Human Welfare* (Denver)编辑,著有《社会科学知识新论》《后现代的政治知识》《政治学的知识脉络》《社会科学方法新论》《当代政治学的新范畴》*Navigating Sovereignty: World Politics Lost in China*等。

电子信箱: cyshih@ntu.edu.tw

陈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政治学研究科联合培养双博士项目博士候选人。

电子信箱: chenzhengpk@gmail.com

曾向红 兰州大学讲师。2004年在长沙理工大学获交通工程专业学士学位,2007、2010年在兰州大学分别获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lzxzyyj@yahoo.cn

李卓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2004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lizhuo1986@gmail.com